全球對話 4.4

GLOBAL DIALOGUE

4 issues a year in 14 languages

ISA的65週年

Margaret Archer,
T.K. Oommen,
Immanuel Wallerstein,
Alberto Martinelli,
Piotr Sztompka,
Michel Wieviorka

義大利勞工

Mimmo Perrotta,
Devi Sacchetto,
Luisa Leonini,
Alessandro Gandini

大學危機

John Holmwood

> 黎巴嫩的宗派主義

> 埃及的吉普賽人

> 法國的跨國戀人

> 土耳其的抗爭幽靈

> 哈薩克的媒體

> ICSU 和地球的未來

> 羅馬尼亞團隊

MAGAZINE

GD 第4卷 / 第4期 / 2014/10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主編的話

ISA的65週年

為了慶祝 ISA 的 65 週年，橫濱大會邀請到了前會長來回顧以前和放眼未來。他們的發言在這期全球對話中刊出。他們批判了英語做為通用語言的缺點，並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講雙語。而規模越變越大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認為很好，有的人卻很擔憂。Immanuel Wallerstein 回憶到其第一次的大會上，那是 1959 年。那時的知識交流相當緊密，幾乎都是知名的社會學家參與，但是也都是來自全球北方。Margaret Archer 則認為包容性改善很多，還要繼續前進。但她也批判研究委員會的增多，讓 ISA 巴爾幹島化，也妨礙了發展更全面的社會學觀點。部份原因是專業化的深化，也就是注重 IF 和 PI 的結果，讓很多研究其實很膚淺。的確，John Homwood 也批評了學術評鑑審查的文化。

這也是 Michel Wieviorka 討論的議題之一，他討論過度專門化的危險，以及數位化的挑戰。其認為社會學研究不可忽略現代性的惡。T.K. Oommen 討論了全球社會學的阻礙：民族國家的預設，並認為我們必須把民族和國家分開，並且期待可以超越國家的力量。Piotr Sztompka 則把全球化視為是「很多個世界的一個社會學」，並批評那些把政治帶進社會學的人，不論是革命者或是本土社會學運動。最後，ISSC 的新會長 Alberto Martinelli 則討論社會學可以為全球氣候變遷所貢獻的地方，以及全球的民主治理。

這些都是頂尖社會學家的聲音，為社會學提出針砭和把脈。但是全球社會學已經再次討論了年輕社會學家如何在面對挑戰時展現創意和勇氣。這期也討論了義大利的移工和義大利青年怎麼面對經濟危機。也討論黎巴嫩的宗派主義和菸草農在戰爭區的生存。此外，有篇文章討論埃及的吉普賽人，也有文章討論法國的移民，以及土耳其的 Gezi 抗議。另外有論哈薩克的媒體的現況文章，還有自然科學家怎麼處理地球生態問題的文章。總之，儘管會長們提出批判和警告，但是社會學依然相當盡責，持續告訴大家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

全球對話以 14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ISA慶祝65週年：回顧與展

GD

Global Dialogue is made possible by a generous grant from SAGE Publications.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Zohreh Sorooshfar,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suke Abe, Yuri Hitomi, Yutaka Ito, Seijiro Katayama, Koki Kawakami, Ayaka Komiya, Masahiro Matsuda, Masakazu Matsuzaki, Yuka Mitani, Nami Morodome, Hiroki Nakamura, Masaki Okada, Takazumi Okada, Yukari Sadaoka, Fuma Sekiguchi, Kohei Takejiri, Misato Tsuruda, Kazuki Uyeyama, Wataru Wada, Tomoko Wakiya, Kasumi Yamauchi, Sakiye Yoshioka.

波蘭:
Mariusz Finkielsztaj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ła, Kamil Lipiński, Przemysław Marcowski, Kuba Barszczewski, Martyna Miernacka,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Adam Müller, Zofi a Penza, Konrad Siemaszko, Anna Wandzel, Hanna Wierzbicka, Marcin Zaród.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Telegdy Balazs,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Ruxandra Iordache, Andra Larionescu, Mihai Bogdan Marian, Monica Nădrag, Mădălin-Bogdan Rapan, Alina Stan, Oana Mar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Yonca Odabas, Günnur Ertong Attar, İlker Urlu, Zeynep Tekin Babuç, Hüseyin Odabaş.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ISA的65週年 2

> 前會長們回顧與展望

世界的社會學 4
by Margaret S. Archer, UK, ISA 前會長1986-1990

全球社會學的前提 6
by T. K. Oommen, India, ISA 前會長 1990-1994

ISA作為組織：成長的隱憂 8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USA, ISA前會長1994-1998

ISA對全球民主治理的貢獻 10
by Alberto Martinelli, Italy, ISA 前會長 1998-2002

實證主義宣言 12
by Piotr Sztompka, Poland, ISA 前會長2002-2006

數位化、學科性、惡 14
by Michel Wieviorka, France, ISA 前會長 2006-2010

> 義大利勞工

義大利南部的移工 16
by Mimmo Perrotta, 義大利

罷工反對合作社 18
by Devi Sacchetto, 義大利

面對經濟危機 20
by Luisa M. Leonini, 義大利

自由職業的興起 22
by Alessandro Gandini, 義大利

> 黎巴嫩

黎巴嫩宗派主義動態 24
by Rima Majed, 黎巴嫩

在戰爭區種植菸草 26
by Munira Khayyat, 埃及

>危機中的大學

高等教育的評鑑審查 28
by John Holmwood, 英國

> 被歧視的外來者

埃及的吉普賽人 30
by Alexandra Parrs, 埃及

跨國戀人 32
by Manuela Salcedo and Laura Odasso, 法國

> 政治和媒體

土耳其的幽靈 34
by Aylin Topal, 土耳其

哈薩克的民意操弄 36
by Almas Taizhanov, 哈薩克

地球的未來 38
by Emma Porio, 菲律賓

羅馬尼亞編輯團隊 39
by Ileana Cinziana Surdu, 羅馬尼亞

> 全世界的社會學

by Margaret S. Arch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國, 前ISA會長, 1986-1990

Margaret Archer.

沒有所謂完美無瑕的視野。從最一開始，我當會長的看法，是透過 UNESCO 的角度，也就是 ISA 是成立來幫助「聯合世界上的社會科學家」然後讓這個學科前進。65 年過去了，在「高」與「低」現代性的分野中，ISA 本來可以按照這個邏輯去組織的，但是實際上 ISA 卻沒有這麼做。ISA 反而從一個由下而上的會員視角出發，形塑了歷史，並超越了結構和文化的限制。回顧過去，似乎在時間分期和 ISA 的歷史上有著重疊。善意沒有缺少過，不過預測卻似乎是少了些。

而讓 ISA 沒有站在精英知識立場上、反而以更全球整合的姿態而組織起來的原因是什麼？我下面要說的是由我的經驗所出發來立論，這要從 1966 年的世界大會說起。那次大會在 Evian-les-Bains，這剛好就是我現在正在寫這篇文章所在之地的 6 公里之外。就像那個地方一樣，那次大會規模很小，與會者彼此都認識，幾乎都是歐洲人。而美國的影響也很強，可是最活躍的卻是來自東歐的移民。我們很有趣地邀請了 KGB 的人來參加，但是沒有什麼火花就是了。

這一切可能要歸因給語言霸權。多數北美的學者，包括英國學者，都只會一種語言。而溝通的基礎也是一個障礙，像是手動打字、沒有影印機、不安全的電話和郵件等等。在 60 年代末，我那時是 Current Sociology (1973) 的主編，那是一個 Trend Report 的引用文獻，必須用一大箱包裹起來的檔案和卡片來編輯。我在古老的 Remington 上打字是很快樂的，不過更重要的是，為什麼 Trend Report 是重要的呢？因為早在網路時代以前，唯一類似的來源是 Sociological Abstracts，這也要謝謝 Leo Chall 和他老婆的付出。我稱這個時代是冷戰時代。

> 經驗主義聯合了冷戰學者

的確，社會科學哲學支持了經驗主義，並且當其沒有什麼希望的時候，卻意外地聯合了東方和西方。西方國家則在第一台跟一個房間一樣大的電腦問世的時候開心不已，這是所謂巨量資料的開始。在東歐，細緻的統計研究躲開了政治正確的審查。此外，統計也代表了一種世界語言。在 1970 年代的大會中，幾乎所有的 session 都開始看到回歸數據表，開啟了類似數學的討論。

這不代表理論已死。相反地，Uppsala (1978) 的一場著名的辯論：Parsons 和 Althusser，至少數百名學生從滂沱大雨中走到很遠的一間教室去聽這場辯論。而當主持人宣佈很可惜兩位講者都沒能前來時，大家落寞地離開了。

ISA 並不缺乏善意。我們審慎地在東歐舉辦的執行委員會，從 Bulgaria, visited Tbilisi, Ljubljana, Budapest 等地方偷偷地把文件運出來。透過不斷地造訪波蘭，我們結交了許多朋友。那

>>

個時代國家學會還是 ISA 的主力時，我們在共產黨和波蘭個人會員的關係表面上小小推了一把，而在 Jab onna 的盛大款待下，我們其實很擔心這可能是我們同事一個月的食物花費。廚師說要款待，並在星期四給我們 zrazy zawijane，不過雖然整個下午都聞到食物的香味，可是晚餐遲遲沒有來。最後，我們看到從 Warsaw 來的車子，而廚師則告訴我們這個是教育部的晚宴，不是我們的。總之許友誼還是長存，在 1989 年，許多人喜歡到 Gdansk，然後當團結工聯解開卸扣時，我們則待在造船廠。

> 墨西哥來的警訊

ISA 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其實很友善，可是卻忽視了被壓迫的群體。ISA 的歐洲中心主義和北美的自成一格，其實很少人對於其他的大陸有什麼深刻的認識。當然也有例外，Tom Bottomore 對於印度和 Alain Touranie 對於拉丁美洲的豐富知識。而 1982 年在墨西哥舉辦的世界大會，我們很驚訝墨西哥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的學生對於參加世界大會是那麼的踴躍。我們設立了特別場次，不過學生們說：「你們來到我們的國家卻不說我們的語言，不關心我們的議題？」所以我們知道了。而 Cardoso 也被選為會長。雖然這也是在西班牙被列為 ISA 官方語言的很多年前的事。

而在 1986 年於 New Delhi 的世界大會，Martin Albrow 和我已經發行了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的期刊作為延伸用。Daniel Bertaux 納入了一個地理和語言都包容的年輕社會學家競賽，包括了 14 種其他語言和場次，讓大家暢所欲言被邊緣化的感覺和經驗。而西班牙文最後變成了官方語言。我們的 1990 大會是「全世界的社會學」，我們會長也說也是這個主題。多數的執行委員認為我們正在國際化的進程上。但我卻沒有讓另外一小部份納近來，那就是越來越重要的研究委員會。

> 20 年的巴爾幹島化

一開始，研究委員會的專長似乎是合理的專業社會學家的世界觀，有各種興趣。當其影響力越來越大卻沒有考慮到碎裂化的問題的時候，兩個非預期後果相互產生了。第一，有些研究委員會排除其他方法，獨尊一種教條。第二，研究委員會太多了，但是缺少社會學家去研究晚期現代性，且許多人並不滿意。總之，ISA 提供了越來越少的討論機會去討論「我們要去哪裡？」

> 未來展望

當研究的官僚管制越來越多時，新的衡量指標究越來越多，充斥著學術界。這些代表著早期的學者學習了很不成熟的學科分也去定位自己，若是他們有做過田野，就不會這樣。而發表的壓力和大家擠破頭要去把 CV 弄得很好看很滿的趨勢也讓人做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不寫書，更不用說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同時，世界議題的討論平台也沒有。議題像是歐洲的脈絡，全球暖化，不平等惡化，財金的資本主義和文化公共的數位保證等等，都沒有討論。而對於新自由主義或是沒有另外一個世界等的觀點也沒有機會去辯論。

新的執行委員組成相當國際化，這可以在巴爾幹化前提之下鞏固全球的代表性，也可以形成新的國際研究綱領，去處理全球議題，解釋這個世界走向何方。我曾經覺得作為前任會長，最好的角色是不要發言，可是我後來改變了這個想法，畢竟，我們都有責任與特權，只能讓這個組織更上一層樓。■

來信寄給 Margaret Archer <Margaret.Archer@warwick.ac.uk>

> 全球社會學的前提

by T. K. Oommen,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 印度, 前ISA會長, 1990-1994

T.K. Ooommen.

ISA 成立的目的是推動國際的社會學，可是我們對於這個概念是什麼意思還沒有達成共識。當然，有可能的一種看法是各國社會學的累加，但是以人口學的角度來說，國家有很大的相異性，因為有超過 10 億人口的國家 (印度和中國)，也有 5 百萬人或更少的國家。此外，社會結構和文化也是因國家不同而變化很大。有些國家是多民族所組成的，有些是多族群的，有些則是多個部落所組成。有些是典型的民族國家，有些則是想成為民族國家。若要把這些不同的基礎當作是全球社會學的前提，那會很難。不過這似乎是 ISA 要做的事情。

就像 Bauman 所說的，「社會其實就等於民族國家，我想這沒什麼例外，不論是概念或是分析的工具，都是如此預設的」。而第一個建立全球社會學的前提就是去放棄民族國家作為分析的基礎，也就是要同時避免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因為理想的民族國家是很難存在的，就算在孕育誕生的西歐也是如此。可是社會學家不能把社會流動、全球網絡、多重社會空間等概念來替換社會的概念，因為沒有社會，這些都不會存在。

第二前提是要克服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之間的分界，若是人類學士分析低劣的他者，那社會學則是研究現代、工業的社會。如 Fallding 說的，「文化和社會人類學其實就是研究原初人類的社會學」。若堅持社會學士現代性的產物，那只會忽視了多重現代性的存在。

智識上的二元對立也在冷戰時代演變成三元結構。這是因為是由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所造

>>

成的，這處也影響了社會文化結構。第三世界被描述成為開發、人口過多、政治混亂的地方。而第二世界則是科技上是現代但是政治上威權，而第一世界是現代的、科技上有效的、民主、經濟發達的。

但是以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角度而言，第三世界包括了三個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從非常不同的殖民經驗所得來的。若是非洲和南亞是被撤退的殖民主義所包含，那麼拉丁美洲則是經驗了複製的殖民主義，包含了許多不同族群背景的移民。這些族群在同一個國家的領土上相處，並沒有成為歐洲的民族國家典型。社會學家則是沒有辦法挑戰冷戰的三元世界結構觀點，繼續把我們對於遷佔者社會的理解過度複雜化，這之中包括的第一和第三世界。

國家和民族的交疊是常見的一種概念結合，也是全球社會學的最大阻礙。「民族傳統」在社會學中總是指向在國家邊界內所從事的研究成果。在柏林圍牆被建立之前，以及倒塌之後，德國社會學只有單一民族傳統。可是要知道的是，有好幾十年的時間，其實是有兩個傳統的。在第二世界蘇聯社會學瓦解之前，其實他是包含好幾個國家的社會學的，但是要到了蘇聯解體後，他們才被承認。

把社會學和民族國家連結起來是和這個學科的本質相互衝突的。社會學分析各個社會結構和文化，不論現代、前現代、簡單、複雜、農業、工業等等。若社會學對於多元還有興趣的話，民族國家則是對於同質化有興趣。所以社會學的靈魂和民族國家是相反的，但是現在被鎖進同一個身體裡面，讓社會學的國際化無法實現。

再者，把社會學和國家連結是對民族很有問題的，因為有些民族其實還沒有成為國家。有所謂的法國社會學，但卻沒有布列塔尼半島社會學；有英國社會學但是沒有威爾斯社會學。有西班牙社會學但是沒有加泰隆社會學，有庫德族人，分佈在許多國家，但是似乎很難有自己的社會學。而國家社會學的命運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和一國的政治有關，若沒有民族國家，就沒有社會學。我們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意義的談論國際社會學嗎？

有些人可能會說我們已經看到民族國家的沒落了。第二世界的解體似乎讓人覺得地球村時代來臨了，而全球社會學也似乎快要誕生了。但這發生在政治和經濟上，在社會和文化上並沒有。所以要說有個統一的全球社會學誕生了，是很不切實際的。但是，因為單一的交流溝通組織的確存在，有些人期待一個世界社會的誕生，可是就我看來，這有點像是在純科學之後去創造社會學的那段歷史一樣。在我的第十三屆世界大會會長致詞中指出的一樣，20 年前我就說過：「若世界社會是所謂的一個文化、一個文明、一個溝通系統，那麼這不但不可能，也不可欲。」

我用兩個觀察來總結我這篇文章。第一，儘管人類社會轉型了，但是有三個面向是共享的：同一性 (哲學領域的論證)，多元性 (社會學所稱)，社會過程 (文化多元論者所述)。這些面向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面貌，可是都基本上存在。這些提供了國際社會學的希望。但是與其聚焦在這些基本面向，社會學仍須解釋政治、經濟、科技、媒體、生態等等，把結構和文化關聯啟來到更多的領域。

第二，社會複雜性的變化來自於階層化、異質性、層級，而比較少來自經濟發展或是政治體制。人類社會是以階級、性別、年齡等等所分化而成，而且當這些在文化上越來越不同時，特別是宗教、語言、民族時，重疊性導致了更複雜的體現。全球社會學必須追求理解相同性和相異性，避免普世主義的同質化危險，以及本土主義的狹隘視野。的確，比較社會學是邁向全球社會學的一扇大門。■

來信寄給 TK Oommen <tkoommen5@gmail.com>

> ISA作為組織 成長帶來的隱憂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Yale Universty, 美國, 前ISA會長, 1994-1998

Immanuel Wallerstein.

我參加的第一個 ISA 世界大會是第三屆在 1959 年於 Stresa 舉行的，那是義大利的北方小鎮。自那時候起，我參加了 15 屆的其中 13 屆。若要說說我的感想，我可以比較一下 1959 年的大會和我擔任會長時期的大會 (1994-1998)，以及今日的大會。我希望可以從 4 個方面來討論這個組織的發展：大會參加者的組成、語言、ISA 的結構和議程、規模的影響。

> 參與者的組成

官方對於 1959 年大會的資料顯示參與者有 867 人，而發表的大概有 300 人，多數是歐洲和北美學者。我記得只有一個從第三世界來的活躍學者：埃及的 Anouar Abdel-Malek (但是他在 Paris 工作)。這也是第一次有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人來參加的大會。多數是哲學家，但是地主義大利的與會學者的也很這多是哲學家。社會學是新的領域，ISA 扮演了催生者的重要角色。

而我擔任會長的時候，參與這更加國際化。但是，分配還是不平逡，因為與會的支出讓許多國家的人無法前來，即使很多國家都有社會學了。

2014 的大會參與者在 ISA 的努力下，雖然不盡理想，但是更為平均了。一項很大的進步是女性參與者和發表人。我想未來為繼續進步下去。

> 語言

ISA 的一開始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法語。1959 年法語是廣為被使用的，可能使用的人數還比人數遠超過的 2014 年還多。那時許多參加者即使不能說，也可以聽得懂法語和英語兩者。而且除了額外場次以外，不需要翻譯。

在地一次第三世界舉辦的大會是 1982 年的墨西哥。當然那時有許多墨西哥參與者，也有許多拉美學者前來。而法語和英語的使用讓墨西哥的參與者不滿，要求講西班牙語和翻譯。Alain Touraine 透過把英語和法語翻譯到西班牙語撫平了一些不滿的情緒。而西班牙文後來成為官方語言。

可是，除了一些很少數的場次，英文變成了唯一真正在交流的語言，因為若場次是法語或是英語發表，那英語的聽眾就會跑掉。當我是會長時，我組成了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而這個委員會是 Alain Touraine 所組織的。他們做出了建議，可是卻被忽略了。

而部份原因是國際的參與提昇，有更多的

>>

人其母語不是這三者的其中之一，而對多數人而言，英語是第一個「第二語言」。這和世界體系的美國霸權有關，而早期的世代學習法文、德文、俄文等當第二語言，可是年輕人則是英語。

就像任何的國際組織一樣，ISA 有世界語言的負面影響。比較不好的世界語言被使用，而說與寫的版本又有很多。另外，當美國衰落，會要求有其他的語言：若是中文和阿拉伯文變成科學溝通的大宗時，ISA 怎麼調整？

> ISA 的結構

1959 年，國家學會委員會的代表選出了執行委員會。當蘇聯也加入後，這個變成了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檯面下交涉。

此外，當時也只有兩個研究委員會。他們是真正的研究委員會，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在辯論理論，而是真這的做跨國研究。大家不可以自由加，而要接受邀請。結果，後來委員會數量增加很多，有 4 個人就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的例子。

ISA 結構的主要任務是選擇下個大會的地點和議程。一位副會長負責議程，並且和議程委員會討論，而沒有成員是 ISA 委員會的成員。這相當不同！這是為了增加成員的多元性，而且會長甚至也不參加議程的討論。

而幾十年下來，ISA 設置了許多副會長，但是我任內的時候議程副會長還是最主要的副會長，Alberto Martinelli 則組成了委員會，但是其他副會長也會受邀。在某個時間點，議程副會長的主要地位被研究委員會所取代了。而最後，議程這項工作變成是執行委員會的責任了。

我相信這是 ISA 會後悔的一項決定。不同於讓 ISA 成員選擇興趣所在，現在變成了讓許多派別的興趣來決定議程和時間分配。若是執行委員會被某個派別所把持，那真正整合的議程就不可能誕生。若是執行委員會分裂，那就會停止運作。我希望 ISA 可以回復到之前的方式，讓議程副會長有這個權力和獨立性。

> 規模的影響

增加出席的正面影響和地理分配是很明顯的。ISA 成為了更包容的組織。可是包容也可以是排他的。1959 年所有參與者都是重要的。小規模的會議有著真正的知識交流。

但是一旦有了 6000 人，大量的研究委員會和特別會議增加了，沒有了真正的知識激盪。一個場次有 4 或 5 篇論文，只有最多一、兩個問題的回應。許多參與者是被動的。

想要真正有辯論和合作的空間的必須是小型會議，而且是在大會之外。我們所有人的精力都有限，時間也有限，金錢也有限。大規模促進包容性，但卻沒有提昇參與性。我想這問題很難解。或許可以有些場次是小群體的，自我組織的，沒有論文但是有辯論進行。不過要組織這種型態的會議很難，或是太過於烏托邦。但是這也再次強調了議程委員會的重要，組織不應該只是少數特定興趣的維持而已。■

來信寄給 Immanuel Wallerstein <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 ISA 對 全球民主治理的貢獻

by Alberto Martinelli, University of Milan, 義大利, 現任國際科學協會會長，前ISA會長, 1998-2002

Alberto Martinelli.

回首過去，社會學和ISA有的長足的進展。放眼未來，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讓其更加國際化。推動國際全球社會學一直是ISA的主要目標。歷任會長也多所貢獻，我的任期是1998-2002，例如我就成立了博士生的實驗室，是個持續成長的努力，並且在這次橫濱大會就看得出來。

可是，還可做得更多。有兩個原因我認為ISA應該繼續努力。首先，全球社會學的成長可以改善社會學研究的品質和更貼近社會。第二，ISA可以替全球民主的治理做出貢獻(和其他國際社群合作)。

社會學作為科學主要的目標並沒有改變，可是就像ISA一樣，已經全球化了。社會學提問的核心在於基George Simmel所問的：社會如何可能，以及合作怎麼樣讓人們的基本需求滿足，還有社會再生產怎麼保證持續，另外衝突怎麼解決。這些是古典思想家主要的關懷，也是ISA的社會學家的關懷。這個問題還是很重要，不過現在可能要從全球的層次上發問，變成了更困難的問題，因為21世紀的社會世界是個單一又分裂的世界。

古典社會學家有全球的視野，包括不論像是世界經濟的理論家如馬克思或伯瑞圖，或是比較社會學家像是韋伯或涂爾幹。可是後來的時代，也就是我在Berkeley唸書的60-70年代，專業社會學越來越限縮在國家邊界裡面。這個態度已經不再可能了，因為當代的全球化不但指出世界是新的研究對象，並且需要任何的領域

>>

(如在歐洲或是非洲的家庭，或是在中國或是巴西工廠的勞動關係)，不但要比較，還要放到全球的脈絡裡面，每個地區都和其他地區有交織在一起，Glocal 不再是字典上的名詞而已了。

今日和明日的社會學不但要全球化，還要科學與批判，需要有明確的認同，但也要開放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和物理與生物科學合作。這個是國際社會科學委員會 (ISSC) 的目標。這是全球社會科學組織和國家學會的母體組織，我作為會長，主要任務是希望發展真正的科學合作，而剛發表的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提供了豐富的圖像去描繪社會學的研究狀況，特別是在環境領域。這在網路上可以讀取，很值得一讀。而第三世界社會科學論壇 (在 Durban 於 2015 年舉行) 的主題是全球正義。我誠摯邀請所有的社會學家參加，這和千禧年發展計畫的評估會同時進行。而五年其的環境驗就計畫 Future Earth 也會由 ISSC 和 ISCU (自然科學) 一起進行。ISSC 會特別負責子計畫 Transformations to Sustainability。

ISA 本身，和 ISSC 或是 ICSU 一樣，是個全球的角色，在知識推動和技術發展上都是。而在全球化的不同面向上也要建議有效的議程，像是不平等或是全球正義。這樣和其他科學組織一起，ISA 可以對全球民主治理有須多貢獻。第一，多數具有影響力的全球行動者，像是政府、跨國企業、基本教義組織、民族主義運動等，都是被自我利益所激起的，也被權力或是資源所吸引，要去採用單一的世界觀。每個人都被科學成就、教學能力，專業倫理所評量，而非性別、族群、年齡、國家等等。第二，國際科學組織可以是有效的方案對抗教條主義和盲目。我們習慣了各種不同甚至衝突的觀點，提出矛盾的意見，為了去讓一致性和經驗檢驗更公平。科學的論述是反對教條和普世真理的。第三，雖然貿易的便利和外交的需要讓政府和企業故意忽略人權的侵害，國際的科學組織可以扮演更重的的角色。ISA 已經扮演了很好，要會繼續下去，特別是在辯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教學與科學研究自由的面向上。第四，國際科學組織雖然有著霸權文化的語言的影響，但似乎更知道種族中心主義的危險。

這些是一且相關有效的方法，讓 ISA 和其他科學社群可以對全球民主貢獻心力，也可以對抗經濟和文化的宰制。但是若要更有效的話，這些組織必須要有很多會員，支持其計畫與活動。

ISA 有著特殊的角色，因為社會學就是要去探究當代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去幫助人類可以活在和平的世界，去在多元中找到相似性，去維護正義、自由、文化多元。社會學若跨出單單只是解釋社會的任務，那會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社會學家可以對於這些目標有更多的貢獻。今日的世界充滿衝突，所以需要社會學家，而且危機的社會特別需要好的社會學家，因為短視近利的領導者也需要我們。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來信寄給 Alberto Martinelli
<alberto.martinelli@unimi.it>

> 實證主義宣言

by Piotr Sztompka,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Krakow, 波蘭, 前ISA會長, 2002-2006

Piotr Sztompka.

你相信嗎？橫濱世界大會是我的第十一次大會。我 1970 年加入 ISA，那時的大會是在保加利亞的 Varna，是第一次在東歐舉辦。40 年過去了，我放眼過去、展望未來，作為理論家，我習慣看大方向。我看到兩個，一個是好的，一個則是危險的。

ISA 的委大成就已經超越了歐洲和美國，這起始於東歐被納入成為一部份的時候。在 New Delhi，亞洲很有說服力。在墨西哥，活躍的拉美社會學受到重受識。在 Brisbane 和現在的橫濱市，我們看到的亞太地區的活力，而非洲社會學則在 Durban 展現了創意。全世界都加入了，只有中國還沒有。中國的社會學相當有成就，且變動很快。不過中國社會學家在這次橫濱大會很踴躍的參與。

我希望我會變成國際且跨國的。科學無祖國，而社會學不應該有國家界線。對我來說，像是波蘭社會學、法國社會學、巴西社會學等等只有行政上的意義，沒有真實的意思。我認為社會學只有一個。(1)

社會學群體的全球擴張有兩個意義。第一，我們的研究已經身化了，提供了對於生活方式、期待、疏離、等的洞見。第二，社會學對於貧窮、壓迫、歧視、排他等等的情感和倫理敏感度提昇了。即使以形式邏輯的角度而論，價值判斷並非遵從事實，但是社會學來說卻是沒錯的。堅實被紀錄下的事實讓道德感情被啟動了，然後抗拒並且轉換價值。我稱之為社會學的三段論，而非邏輯式的。(2) 這兩者的 ISA 延伸都該被鼓勵。

到目前為止還不錯。可是另外的現象持續著：新的界線意味著社會學社群仍然分裂。我第一個世界大會上，其分列是地理政治的，社會學家來自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俄國等國，會被視為貧窮的。因為這些人是政府派出來的代表，避免公開討論，發表小眾題目的論文，而非加入政治敏感的議題討論。(我第一次在 Varna 的論文是論「社會學的目的論語言」。)

在 80 年代晚期，地理政治的高強倒塌了，新的界線則產生。第一，這些都是奠基在全球階級分化之上的，社會學家從貧窮南方對抗富裕的北方，有這強烈的反美和反歐的性格。然後，認同分裂也產生，文化而非地理政治或是階級政治變得重要。有些是性

>>

別，新的民族主義聚焦在文化上，批判英語的語言帝國主義。

雖然他們可能有危險，但是這些界線反應的分裂。社會學群體是實際社會的縮影。而其一想要超越科學以外的緊張和衝突，這可以理解，可是不能原諒。

然而最近另外的內部爭議也出現了，那是認識論的分野。比較不出聲音的多數人認為社會學是在提供社會現象的機制和解釋，透過系統地和方法論上可控制的方式去研究。社會學因此更像嚴格的科學，即使或許和人文科學很相近。若這個觀點不被多數人所接受，那麼世界大會不會有這麼多好的研究，那麼多傑出的人來自世界各地參加大會。

在認識論的另外一邊代表的是一群活躍的少數人，把社會學當作革命的戰場，要推動大眾的運動。也有一些人敵視西方社會學，而提出模糊難懂的「本土社會學」。

社會學作為科學和社會學作為行動，社會學作為普世知識和社會學作為脈絡化的經驗，這些都是爭議所在。我強烈支持前者。Michael Burawoy 稱我是「最後的實證主義者」(3)，我很榮幸，因為我很高興當實證主義者，而不是最後的「列寧主義者」。社會學家厲害的不是發動革命，而那些想要這麼做的人最後只是在偽裝自己，像是把研究生當穿上紅衣服，或是把學術界當作政治場域。

社會學可以提供這個貧窮、剝削、排他的世界的最大價值就是透過紮實的研究去找出社會運作的機制與規律，若人真的想要改變不平等和不公不義的社會，第一件事情是要去了解社會。Karl Marx 之所以讓人紀念是因為資本論，而不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他研究了布爾喬亞社會的階級機制。他的生命大多數時間是在圖書館，不是街頭。

對學術價值的注重，就是追求適切的描述、好的解釋、好的詮釋、深層的理解，並透過理性、研究、邏輯的力量，把附加價值帶進來：他提供了絕佳的空間去在社會學社群內建立共識，不論各種政治、階級、文化的利益有多麼分化，最後科學價值可以把全部都統合起來。

讓我們回到我們的工作上面，把政治、政治人物、意識形態留給革命黨人。社會學的組織不應該是意識型態的鬥爭場域，但應該是學術辯論的溫床。我的夢想是 ISA 可以成為更學術的群體，而不是社會運動，工會，或是政黨。ISA 應該是按照學術議程來組織，而不是政治結合，用論證取代口號，讓思考引領行動，而不是追隨行動。我希望看到 ISA 透過普世價值來整合，透過理性來組織，追求知識，超越任何分裂與利益。

像是 Antonio Gramsci 常說的，要去預測社會現象就是去讓預測成真。這就是要我們把 ISA 從「政治正確」和潮流的方向拉回正軌。若借用一句名言來說，就是「全世界的是學家聯合起來！」這或許更接近上一任會長的想法。沒錯，但是沒忘了下一句：「除了意識形態枷鎖之外，你沒有什麼好失去的，而且你有整個世界的知識去探索。」■

來信寄給 Piotr Sztompka <ussztomp@cyf-kr.edu.pl>

註 1：Sztompka, P. (2009) “One Sociology or Many?” Pp.21-29 in Sujata Patel (ed.) 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Los Angeles: SAGE.

註 2：Sztompka, P. (2007) “Return to Values in Recent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3/159: 247-261.

註 3：辯論請見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0(4): 388-410.

> 數位化，學科性，惡

by Michel Wieviorka,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法國, ISA前會長, 2006-2010

Michel Wieviorka.

我很榮幸和高興擔任 ISA 的會長，收穫也很多。卸任後四年的現在，我想我可以談談這個組織。有三點值得提出來討論。

首先，我們都知道 ISA 是開放給那些由於政治理由無法輕易參加的學者的，就像冷戰時期的共產國家和現在由於台灣是 ISA 會員而中國沒有加入等等的例子。我很高興現在有了進展，因為這次的議程看到的有中國改革和社會變遷的專門場次，這是由中國和日本社會學會共同組織的。

第二，若是社會學肯定文化多元的重要性，那麼我們也必須這麼做。這是為什麼在我任期內我總是為了多語言而戰。我們。是為應該要可以用除了三種官方語言以外的語言溝通，就像我們這次在日本用日本與一樣！在墨西哥，1982 年的那會上我們只有兩種語言，英文和法文。但是來自拉美學者和學生的壓力讓我們加入了第三個官方語言：西班牙語。在橫濱，我想要看到更多防止我們往後退的努力，因為我看到的海報全都是英文，這一點想像力也沒有。例如，你看到在開幕場次的字幕全都是英文，為什麼不是法文？這場也沒有同步翻譯。當然這會花錢，但是經費問題不能用來解釋為什麼我們連討論這個議題的機會都沒有。若我們只用英文思考和閱讀，若我們只選出從西方來的會長，我們要怎麼稱之為 ISA 呢？

而社會學的西方化有也危險。這是一種西方或是美國霸權的種族中心主義。是啊，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普世主義。我們須討論普世價值，那是為了調整，而不是會了複製另外一個種族中心的西方秩序給社會科學社群。

第三，ISA 是個提供知識支援和生產的組織。沒錯，我們喜歡 ISA 成為科學知識的空間，有很多研究委員會，但是我們也需要制度去發展我的個體和集體的活動。社會研究不能服務於特定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利益。研究必須來自研究者的好奇心，必須要承擔風險，也要鼓勵前瞻性的研究。我不是要反對那些有用的研究成果應用，但是我長期以來都在做 Michael Burawoy 所說的公共社會學，我認為知識不能只在象牙塔裡面。但是若我們將要生產和傳播知識的話，我們必須要有反身和批判的自由，這種自由需要制度的支持。以下我要提

>>

出三點社會學所面臨的挑戰。

> 數位時代的挑戰

我們進入了快速變遷的時代，網路是關鍵。新的科技和巨量資料也有重要地位。社會學也進入新的時代，我們的思考模式、研究對象、方法、典範、工具等等。這些代表了新的機會。我們要去用不同的方世工作，和其他像是藝術、人文、生命科學等的領域合作。寫作和發表也在改變了，發表的模式也激烈被討論，像是開方使用期刊等等的議題。圖書館也仍然很重要，但是角色不同了。我們會被知識生產所挑戰，也被其他行動者挑戰，他們有能力去動員大量的知識、經濟、實際的資源。新的不平等也會產生，例如那些擁有巨量資料的人或資金去使用複雜程式的人，一定擁有更多權力和資源。在最後的 20 年，我們越來越使用「全球」這個字，我們也進入了非常不同的全球化年代：數位化時代。

> 學科高度分化的危險

世界上可研究的對象增加了。年輕學者又有比較好的訓練，並且比上一代好很多。而且他們也更面向世界，參與網絡，有更充實的全球人生，這是 30-40 年前所沒有的。但是他們卻更加專門化，通常只是在很狹小的問題上很專精，而特殊方法的發展也讓有些社會學家並沒有加入政治或歷史問題的辯論。這帶來的挑戰：我們如何對抗分化或是過度的分工呢？我們怎麼從特殊的領域移動到更全面的社會學關懷呢？這很重要，我們必須結合特殊的興趣，並且加入辯論，不論是在全球、區域、國家、地方的層次都是如此。話劇話說，我們應該同時是社會學家也是知識分子。我們不應該接受高度分工的模式，這也是為什麼 ISA 的世界大會很重要。我們有全球的社群，也不論我們的國家或制度的不同而阻礙了知識的交流。的確，在過去有很多辯論是意識型態而非科學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特殊的利益而停止知識交流。

相關地，當我們偏好多學科多元性時，我們也知道大學和學術系統並沒有幫到什麼忙。社會學家必須是這股孤立潮流的先鋒，挑戰學科分界，以及學者者因此而有的學術生涯分工。

> 面對惡

我試著成為樂觀主義者，相信社會運動和衝突會產生新的社會關係，或是轉變制度。可是有些我住過或是到過得地方，我認為危機比衝突或是運動還要強大。這就是所謂的反運動：暴力、民粹、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基本教義、反猶主義等等，這些都在成長中。社會運動的理論應該也要可以解釋反運動。我是 Alain Touraine 的學生，我總是跟隨他的方式。我應該把惡視為我們的一部分。是的，研究社會運動和反運動是社會學的優先主題。我們必須加入個人的主體性和集體行動的邏輯，並考慮主替化的過程，以及去主體化。■

來信寄給 Michel Wieviorka <wiev@msh-paris.fr>

> 廉價蕃茄的背後 南義大利的移工

by Mimmo Perrotta, University of Bergamo, 義大利

義大利蕃茄採收的移工。Tiziano Doria攝影。

在2013年9月，法國國家電視台France 2報導了在義大利南部Puglia的移工故事。報導名稱叫做Les récoltes de la honte（令人羞愧的收割），其描述了青花菜和蕃茄的收割，並在Puglia販賣給法國超級市場，像是Auchan, Carrefour, Leclerc等，提醒了法國消費者：那些食物很便宜是因為那些工人的工資很廉價。

其他歐洲媒體也注意到了類似的議題。在挪威，有個抗議活動去抗議Puglia的剝削，也讓挪威工會和連鎖超級市場要求義大利工會要提出農業勞動的「道德標準」。英國雜誌The Ecologist也報導了兩個有趣的調查。第一，在2011年8月，pelati（剝皮的罐頭番節）的供給鍊是這樣運作的：蕃茄首先會在Basilicata被收成，由非洲的移工用人工的方式採收。而負責的公司是Conserve Italia和La Doria，最後會被英國的超市所出售(Sainsbury’s, Waitrose, Tesco, Morrison’s)。第二，在2012年2月，他們分析了在Rosarno的Calabria柑橘採收，並要求Coca-Cola公司和其品牌Fanta Orange公佈付給Calabria的價格。

按照這些媒體的報到，義大利南部的農業是低廉工資的產業，並且多數是移工，並且居

>>

住環境很不後，像是貧民窟一樣，也有很多非法勞工，使用農業勞動合約 (caporali)，而且受到來自市場和供給鍊壓低價格的壓力，那些勞工的工作和居住條件很不好，這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移工正經歷了非常困難的條件，並且歐洲農業也快變成「加州模式」：密集農業，剝削移工。

自從 1970 年，義大利南部變成了移民的首選。在農業人口中，大約有 110,000 的移工。而很多人都是非正式的勞工，來自突尼西亞和摩洛哥 (西西里島或是 Campania 的農業)、印度 (畜牧業居多)、非洲、東歐等。

在 Puglia 和 Basilicata 地區，我們從事了田野調查，並選在蕃茄採收的旺季：六月和十月。而蕃茄會到 Campania 的罐頭工廠，然後變成 pelati，這是義大利最有名和出口最多的產品。每年夏天，約有 13,000 到 20,000 的移工，多數來自非洲、中歐、東歐，他們會來找工作。許多從非洲冒著生命危險而來的人，穿過沙漠和地中海，並且到了這裡，在冬天採柑橘，春天採草莓。其他的非洲工人有居住證，是因為在北方工作了很多年，可是在經濟危機時被解僱，現在到南部來找工作。

東歐人總是有永久居留權。羅馬尼亞人是最大宗。在旺季時，勞動需求大，許多人就會到南部去找工作，他們可能從歐洲其他國家來，從家鄉來，然後採收完之後又回家。在採收季節的時候這些移工會住在鄉村的貧民窟中。除了有時候的人道救濟之外，他們沒什麼和工會或是其他組織互動的機會，因為季節一結束，他們就搬到其他地方了。

移工的僱用和居住都是由 caporali 負責，這是一個非正式的勞動合約廠商，這些人都和其簽約的勞工大多視同一個國家的人，但是是為了確保勞動力的供給順暢。而 caporali 提供給工人之外，還提供給雇主服務。他們主要有暫時的住宿，交通，鐵路站，還有超市的接送，另外還有食物、水、信用等等。

更重要的是，caporali 會監工，而雇主要付錢給 caporali 而不是直接給工人。每 300 克的一袋蕃茄可以收到 3.5-6 歐元，但是付給工人的工資要去掉仲介費，還有交通成本、房子、食物、水、等等的成本。而一位工人最多一天可以賺到 80-100 歐元 / 天。最少的則只有 20 歐元。

Caporali 的權力和利潤來自工作的隔離和競爭者的缺乏，不像其他義大利和歐洲的地方會有政府介入，包括勞動額分配，公共工作或是正式的私人仲介 (合作社、暫時的僱用公司等等)，這裡都沒有這些東西。所以當經濟危機發生時，這些工人很難向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樣可以聯合起來一起要求權利。

工人有不同的策略去解決不好的工作環境、控制、低工資等問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最有利的資源就是他們的移動性，因為他們可以自由在歐洲裡面進出，可以來來回回東歐和義大利，而那些地方的開銷也遠比西歐低，所以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作。相反地，歐洲移工的地維比較不穩定，挑戰也多，包括工作場所的衝突、族群衝突 (像是 Calabria 的 Rosarno revolt, 2010 年 1 月)，或是工會衝突 (2010 年在 Puglia 的 Nardò 移工罷工)。

2014 年所有的這些衝突，加上歐洲的媒體，NGO，激進網路和倡議團體等等的注意下，讓 Puglia 和 Basilicata 的政府保證讓移工可以有好的居住地，鼓勵公司要透過工作中心去用勞工，並設立了新的倫理守則。在 2014 年的採收季節，這些措施都沒用，因為再次地，那些農人寧願透過 caporali 去僱用移工，沒有受到那些新政策的保護，而勞工也怕因此失去工作和居住地。■

來信寄給 Domenico Perrotta <domenico.perrotta@unibg.it>

> 罷工反對合作社

移工帶頭

by Devi Sacchetto, University of Padova, 義大利

反對合作社和犯罪污名化移工的Bossi Fin Law

義大利罷工委員會負責管控工作權，保障消費者免於受到罷工而引起的公共服務的損失，包括交通，健康，急難救助等等。2013 年在多起罷工 之後，委員會宣佈牛奶之基本民生必需品，結果，某些品牌的牛奶的運送的中斷就被認為是基本必需品的中斷，也沒有考慮到其實很多品牌都還有供應。當有被合作協力廠商 Granarolo Logistics 和總部位於 Bologna 的食品公司所僱用的數百名移工出來罷工時，委員會基於上述原因否決了他們的罷工行動。可是明明在超市中還有很多牛奶品牌在架上。牛奶或許是必需品，可是要說義大利不能沒有 Granarolo 這個牌子的牛奶，那一點也說不通。

義大利的合作社是在 19 世紀晚期以自我保護的型態出現的，由勞工組織，希望可以避免剝削等行為。在 1920 以前，合作社系統穩固地建立起來，這在北部和中部義大利特別如此。即使法西斯政權也不敢摧毀這個制度。可是這幾十年來，合作社賺很多錢，而且他們的參與到其他領域去為協力廠商服務。合作社漸漸成為是大公司的幫手。

在這個轉變之下，合作社的勞動條件已經變差了，對於社內和社外的勞工都是如此。此外，合作民主和參與也受到侵蝕了。勞動力的族群隔離就是導致合作社團結失敗的重要因素。2011 年有 43,000 個義大利合作社 (1.3 百萬人口)，這是大約 7.2% 的 GDP。合作社很重要，在物流業、零售業、營建、服務業都是。每年的產值大概 1400 億歐元，或是 7% 的 GDP。在物流業中，大概四分之一的勞動力是由合作社僱用。而這就像是國內或是跨國企業的協力廠商。有些合作社甚至是有全

>>

核准暫時勞動力的。

許多公司把生產線都外包給合作社，為的是降低成本和提高競爭力。而合作社則有更少的空間可以幫忙保障平等權利，這對社內員工都這樣了，何況社外。在北部大的地區，地方的公共制度、合作社、工會等都很緊密連結，採取了類似但是不重疊的政治位置去確保「社會和諧」，並且支持地方的工業利益。天主要和前共產的合作社現在都合流了，「L' alleanza delle cooperative italiane」(義大利合作社聯盟)包括了超過 90% 的義大利合作社。他們都強調效率。Legacoop 是前共產的聯盟機構，擁有最大的臨時派遣人力公司 Obiettivo Lavoro。

Granarolo Logistics 的合作社勞工抗議活動只是一連串的其中之一。這影響了 2011 到 2014 年北部義大利的供給和通訊。許多從北非來的移工在過去 10 年來增加很多，並且受雇於合作社。有些案例中，罷工的移工會被開除，他們會有失去居留義大利的危險，於是就會變成非法移民。

第一個重要的抗議是在 Piacenza，這距離 Milan 不遠。這發生在 2011 年夏天，移工和工人要求工資調漲，抱怨工作權益的付諸闕如。而義大利的官方工會讓罷工結散。不過，罷工勝利了。勞工為了要去得到國家的工作契約，調漲工資，假期、生病給付等等，讓資方成功讓步。

最重要的一次發生在 2012 年，在 Piacenza 的 IKEA 工廠。合作社工人大多來自北非，要求提供工資、勞動步調減緩、保障契約等等。他們坐在地上抗議。而警察被找來解決，毆打工人，並解散罷工。幾個月後，在 IKEA 的門市都有工人佔領罷工，這個運動也蔓延到其他地區和交通工業中心，包括了 Piacenza, Bologna, Padua, Verona。大學生也加入，年輕工人、激進左派份子也加入。可是這個抗議的成功是因為北非移民社區之間的溝通管道奏效，並且受到阿拉伯春天革命的鼓舞。

許多移工很熟悉生產流程，因此可以極大化產量和減少損失。此外，他們和一般的工會人員和運動也一起合作。可是許多移工也要用新的方式去組織，把傳統工會看做是保持現狀，而允許管理階層運作。不易外地，工人想要擺脫合作社系統，而且相信最好直接跟公司溝通。

不過，這些世界並沒有帶來更進一步的反省整個合作社運動的整體，而很多人運動人士日為協力廠商和合作社關係不大。簡言之，合作社運動在義大利是很多型態的，從目標到結果都是如此。移工是在提醒這些不同，而且 2014 年的 10 月 16 日罷工也很成功！■

來信寄給 Devi Sacchetto <devi.sacchetto@unipd.it>

> 年輕義大利人

怎麼處理經濟危機？

by Luisa M. Leonini, University of Milan, 義大利

Michael，22 歲， 在一間於 Milan 的知名紅酒廠工作。而他是服務生，有固定任期的合約，是透過社群網路找到這份工作的。他的父親是同一個地區的店員。雖然這個工作包括了準備前菜，Michael 覺得他正在成長中，並且便得越來越懂得知識和專業。特別是他認為他的上司教他很多基礎的知識，成為侍酒師。在 Michael 的眼中，這份工作是邁向專業課程的第一步，將來可取得證照當侍酒師。總之，他很滿意他的工作，讓他認為他有一天可以有自己的事業。

在訪談的時候，Michael 被問及怎麼理解自己成人的轉變，以下是訪談：

Michael：成年意味著首先要承擔責任。負責。但是每個都會說「我是成年人，我二十一歲了，我有車子。」但這不代表什麼！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做什麼的話，那你就不是成年人。你只要…. 我不知道怎麼說…像我認為成年人就是關於工作，你工作，然後負責，也對家庭負責。跟我的朋友比較起來，我認為我比較成熟。

研究者：成熟對你來說是什麼意思？

Michael：就是說你就是成人了，因為我有家庭，我自己賺錢，我也照顧我姊姊的小孩，我會煮飯，我會打掃，並且工作！很少我這個年紀的人做這些都好嗎。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野心，我想要開自己的店，我會試著去做任何事情達成夢想。

Michael 就像其他的受訪者，認為成年就是一種能力，可以照顧他人，接受責任，對自己和家庭負責。而這種對成年的論述是對於時下消費文化中的成年看法不同的。傳統的看法認為成人就像是 Michael 描述的一樣，工作、家庭、親職等等。可是這個論述是被某個家庭位置所強化的。由於他的父母在他妹妹出生之前離異了。他視他自己是家庭最重要可以依靠的角色。而在這個脈絡裡面，他很難去經驗其他年輕人的生活，因為他也有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所以把自己的家庭背景的負擔看成是成人的一種有價值的象徵資產。

比較許多朋友來說，Michael 在有相對有利的勞動力市場上，並且在經濟危機中，因為他可以有能力保護自己，並且還可以夢想未來，累積經濟和象徵資本。

第二組受訪者對成人的看法很不同。和 Michael 相反，他們把成人看作是休閒和消費場域中的自主性，拒絕存款，強調一個人必須學習怎樣找到方法過一天，並在不穩定的環境和工作中生存下來。其他的論述位置多少有點不一樣，因為他們也重視傳統的成人觀點，不過這組人比較強調「每一天都要當作最後一天」。跟之前的受訪團體一樣，這些年輕人的教育程度教低 (多數輟

>>

"consumption is the major space to acquire self-worth and recognition"

學)，而且他們也在比較不穩定的行業裡面工作，而經濟危機來時比較危險。或是他們在低技術的職業有分工作，像是建築工，工友，服務生，搬家工人，等等，並不穩定。

雖然還是要追問下去，我們的假設是對於後者，成年是以機會來定義的。

Federico：我一天工作 10 個小時，一週 5 天。這是超時的。而且你知道嗎，我一個月才 600 歐元！我看不到這個美髮行業有什麼希望，除非你有自己的店。好啦，就算我只有工作一年，但是我的同事，她已經 18 年了，一個月也只有 1300 歐元，你可以用這點錢生活嗎？拜託！

研究者：那你怎麼用這些薪水？

Federico：第一，我買車！然後我買衣服。你看到什麼就買什麼，然後不要想太多啦。我辛苦賺錢就是要買東西，這是我自己賺得錢。

研究者：你打算存錢嗎？

Federico：若我要存錢的話，我會用來刺青。我喜歡刺青，希望整隻手臂都有圖案，但你知道，這樣的刺青可是很貴的，哈哈！

這組受訪者認為休閒和消費更剩於投資，並且發展出一種個人主義的觀點，透過這樣去增加自主性。雖然這可能有點矛盾，因為低工資和不投資未來的看法會讓這些人去大量消費而不存錢，但是就機會的觀點來說，或許消費是主要可以讓這些年輕人可以得到自我價值和認同的方式，而他們或許可以經歷某種成年的獨立和自主感。■

來信寄給 Luisa Leonini <luisa.leonini@unimi.it>

> 義大利的自由職業

by Alessandro Gandini, University of Milan, Italy, ISA專業團體委員會(RC52)

Turin自由業者的共事空間。

過去幾十年來，文化創意產業已經開啟了大量的媒體相關職業，被稱為「創意階級」。今天，這個勞動力市場已經賺變成為企劃案導向和自由業了，有時候因為沒有其他方式，但是卻又增加了個人的選擇，因為這個工作需要在專業和私人領域中找到平衡。

在 Milan，文化創意產業裡面的自由職業是個教科書式的例子去說明創意勞動力。重要的是，名聲的取得是很重要的。記者、顧問、溝通專家、影片製作等等，這些都在不確定和創業之間擺盪，也必須要有自我行銷的歷練，讓這個名氣經濟產業可以運作，讓你進入市場。這主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有時候是數位的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遠距離的互動越來越多。可是要去建立名聲卻要超時工作，要演練很久，壓力很大，也挑戰了傳統對於工作和工作滿意度的看法。

這個快速的自由職業擴張，在歐洲的就業市場資料裡面可以很清楚看得到。自由業讓許多對於獨立和自我組織生活嚮往的人感到滿意，這提供了一種傳統的預算控制的理由去解釋這行業為什麼那麼受歡迎。

十多年前，在創意階級的概念流通之前，有十年的時間裡面，政策是說要去支持個體創業和創意產業的，這不論在知識產業或是專業的企劃案職業裡面都是，多在城市。Milan 毫無疑問的是發展的典範。

> Milan 的自由職業

我們訪問自由職業工作者，主要在都市的知識和文創產業裡面，年齡在 19 到 60 歲，作為溝通、公關、媒體、設計等獨立的專業工作者，這些自由工作者意味著工作是按件計酬，平均所得在32000歐元/年。

>>

可是，這個平均讓極化的現象有了假象，其實超過半數的人薪資低於 30000 歐元。

自由工作者總是被看成是次佳選擇。有受訪者任職於公關顧問公司，40 歲，稱自由職業實際上是一種給較少薪水的策略，而這種表面受歡迎的程度也掩蓋了工作環境不平等的問題。同樣的，一位二十多歲的自由記者也稱 Milan 的自由職業是可以避免就又避免的。

然而，有些受訪者描述自由職業可以提供了較多的自由和自我組織，這就是這個職業的好處。一位中年的女性溝通專業工作者說自由工作是把自己的時間要回來，並且在個體和職業之間有強的結合，然後可以在工作和私人生活間取得平衡。

＞「名聲經濟」

自由工作揭示了一種「社會化」的面向，要求工作的很大一部份是要過社會關係的管理，透過說話、推薦、轉介、名聲。的確，一個人的個人名聲在這個專業網路裡面是很重要的，可以決定獨立工作者的成功和生涯。而打交道的重要性意謂著強調個人品牌和自我形象。

一位 48 歲的女性顧問說，她的名聲是很重要的，因為若從工作辭職之後，她要「重新發明自己」。而辭職後，她建立了各種管道和關係，並且和那些有關、有名的人打交道。這個「關係性」的工作讓她可以延伸這個網路到一個更大的職業供給網路上面。這有些工作也直接從社會媒體來，有人叢 LinkedIn 上看到她，有些是從 Twitter 來的機會。總之自由工作者的型態和傳統工作很不一樣。

在這些「個人履歷」和「無邊界」的職業中，我們看到知識產業中佔了大宗。而一位自由工作者的社會網路鑲嵌程度也透過談話變成了一個人機會的試金石。在社群媒體上專業形象的建立是一種工具性的自我行銷，因為數位化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共事是答案嗎？

大公司變得更少僱用創意工作者，所以自由工作者被認為是一種新的集體關係的建造和社會資本的管理。關係因此造成了個人工作機會的變動。

可是，這也增加了在家工作的數量。雖然有些受訪者認為這個狀況不怎麼讓人滿意，而許多工作者想要從家庭和工作之間的規律模式中獲得解脫。這裡有一個新的組織方式出現了，被年輕的工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決定要去兼顧工作和個人生活的模式。

新的城市累積似乎從城市中出現，回應道友問題的自由工作環境上。最明顯的就是共事空間的興起，這提供了工作者一個分享的環境，可以一起用桌子等設施，一起交流。和其他都市地區一樣的是，Milan 的共事空間很快速的成長。有不同形式的空間，有些在地，小規模，容納廣告和公共關係工作者。有些大規模，分享的不只是空間，還有工作方法。這形成了一種社群主義的關係。■

來信寄給 Alessandro Gandini <alessandro.gandini@unimi.it>

> 黎巴嫩宗派主義的快速變遷

by Rima Majed,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黎巴嫩抗議人士反對宗派主義政治，標語寫著：Laïque Pride，意思同包括世俗主義和同志驕傲。

「黎巴嫩的變化太快了…昨天的敵人可以變成今天的同盟，反之亦然…Sunni 和 Shia 之間的分裂是唯一不變得事情，特別在 Rafic Hariri 的暗殺之後更是如此。可是之前你都沒有這麼聽說過啊，我們知道都都是穆斯林和我們一 起並肩作戰對抗基督教的政治計畫…現在變成是基督教變成我們的盟軍，然後居然說要一起對抗 Sunni 派。」

Hasan，Shia 派戰士， Amal 黨。(1)

雖然宗派主義總體上代表了穩固的社會和政治關係，並且從宗派的標準出發，可是在黎巴嫩，關係總是很快就變了。這個快速的轉變帶來了一個問題：什麼是宗派主義？在黎巴嫩又意謂著什麼？宗派的分化又怎麼那麼快，特別在這個權力平衡的國家中？

前總理 Rafic Hariri 的暗殺發生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那是一場政治的大地震，整個重組了黎巴嫩的政治地景。史上最大的抗爭發生了，並且分成兩個陣營：「3 月 8 日聯盟」是控訴美國、敘利亞、以色列暗殺了 Hariri；「3 月 14 日聯盟」直接控訴敘利亞政府對於暗殺的支持 。一開始，整個暗殺事件其實很不明朗，兩個陣

>>

營都包括了彼此相互敵對的政黨人士。而反敘利亞的聯盟包括了許多基督教、Druze、Sunni 等的群體。另外支持敘利亞的則包括了 Shia，主要是在 Hezbollah 和 Amal 黨的支持下，一年後加入了基督教黨 Free Patriotic Movement。這是從 1975-1990 內戰以來第一次基督教和穆斯林一起合作。

雖然目光都放在兩個群體的聯盟上面，分裂也發生當中，並且很快變成了 Sunni 和 Shia 的對立。2008 年 5 月，政治危機爆發，5 月 7 日，Hezbollah 戰士和同盟動員要佔領首都 Beirut。而暴力很快的擴散到其他地方，在 Tripoli 和 Shouf 的暴力最為嚴重。雖然許多派別 (Druze，基督教，Alawi 黨，還有非宗派的政黨像是敘利亞社會主義民族黨) 已經加入這場對抗，但是還是被認為是 Sunni 和 Shia 之間的衝突。

宗派主義和政治是一體兩面的。政治組織若是按照宗派主義來發展，那麼政治和宗派就會交織在一起。此外，多數的政黨是有清楚的宗教群體的，這讓政治衝突容易演變成宗教衝突。然而，宗教的分化主要是依照反對團體的能力，規模、權力、經濟、軍事力量來決定的。

雖然許多對於黎巴嫩的分析都放在宗派主義，可是這些分析並沒有辦法解釋政治和經濟的因素怎麼促成宗派主義。雖然所有的宗派認同都有重要性，可是只有一些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換句話說，真正重要的是黎巴嫩社會的動態，而非宗派主義本身，也不是宗派主義的政治化。

在個人的層次，宗派認同可以超越宗教團體，包括了清楚的政治和社會意含。說某個人是 Sunni 派或是 Shia 派，在黎巴嫩代表了不只是宗教，還是政治意義、社會歸屬、社群忠誠等等。宗派和政治認同總是可以替換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基督教認同已經在黎巴嫩政治上不再重要，因為其只有在社會上重要。而基督教社群也分裂成兩個政治陣營，那就是上述的「3 月 8 日聯盟」和「3 月 14 日聯盟」。這個例子顯示了黎巴嫩社會分岐的內容和邊界是永遠流動的，而認同是不斷定義和重新定義的，隨著政治界線改變。這個觀點和把宗派視為不變和本質的觀點是大相逕庭的。

雖然 Hariri 的暗殺是個轉捩點，而重新組織了之前就存在的宗派關係，變遷的根源主要還是在內部社會經濟的因素，此外，中東地理政治的改變和伊朗、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以色列、美國等的外部角色也很重要。而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對立被 Sunni 和 Shia 的對立所取代也是基督教沒落和 Shia 興起的原因。

Taef Agreement 把 1990 年的內戰中止 了，並且修憲給許更多的政治權力給 Sunni 派，而軍事權力則給 Shia 派，然後透過把總統角色若化將基督教派邊緣化。社會經濟原因也解釋了宗派論述的重組。Shia 的社群向上流動，透過都市化和遷徙，讓許多 Shia 派的人成為主要的投資者和重要經濟人物。同樣的，Hariri 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特別在內戰後，重構了 Beirut 的階級關係，創造出了經濟精英的新階級，讓舊的階級 (基督和 Sunni) 消失，他們主要是地主和商人。而透過 Taef Agreement 的政治權力，Sunni 和 Shia 的社群也成為最主要的競爭者。

像是其他地方一樣，黎巴嫩的衝突是經濟和政治的。衝突透過不同的形式出現，特別是不同的認同的形式。但是這個重疊並不代表說這個衝突是認同的衝突。承認宗派的變動本質和解析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可以讓整個政治衝突更明朗，也是其他社會分裂分析的重要方法。這個方法是很必要的，特別用在阿拉伯地區的衝突和在敘利亞及伊拉克極端主義運動的理解上，格外必要。■

來信寄給 Rima Majed <rima_majed@hotmail.com>

註 1： Hassan 是假名。他在 1975-1990 參加內戰，然後在 2008 年 5 月上街頭，加入了暴力抗爭。

> 在黎巴嫩戰爭地區種植「苦的作物」

by Munira Khayya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捆綁剛收成的菸草葉，然後曬乾。這些工作主要都是小孩、女人、老人在做的。Munira Khayyat攝影

在阿拉伯世界暴力事件頻頻發生，特別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中海東部地方的戰爭，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注意到日常生活的一般事物是怎麼持續展開和維繫，是很難的，甚至不太可能。其中一個規律的循環就是菸草的種植，已經遍佈南黎巴嫩的山上，滿山遍野。幾百年下來，在夏季的6、7、8月是菸草的季節。即使烽火四起，菸草的收割讓這個地區得以有一絲生生不息的象徵。

被稱為「苦作物」的菸草是在是在黎巴嫩南方的山丘上生長的，而擁有者是一間國有公司Régie Libanaise de Tabacs et Tombacs所壟斷(Régie)。沒錯，菸草是一種不好、消耗勞動力、致癌、剝削的市場商品。環境和人道團體提倡在該地區應該以麝香草替代菸草栽種，或是設置用水採收菸草的方式，取代現有的農業模式。可是黎巴嫩的人不可能放棄菸草。對於他們來說，菸草就是生命，為他們帶來收入與生命保障，無可取代。菸草對於這個歷經戰亂與暴力的地區的人，是種苦澀的依靠。

今日的菸草農業成長很快，因為自從黎巴嫩2006年的最後的戰爭週期以來，儘管戰爭最後階段以色列投下了數百萬的炸彈到黎巴嫩南部，菸草的產量非常大。不過那年因為戰亂，菸草收成少之又少，可是後來就復甦了。

煙草現在遍佈南方，取代了原有的橄欖和柑

>>

橘作物，而菸草只能被消費使用，不能吃。在這個烽火連天的地方，菸草也取代了畜牧，因為畜牧很難在這個戰爭區域維繫下去。而南方人就越來越依賴這個有爭議性的農業維生。

菸草是一種很硬的種子，必須要在酸性的高地上生長。其栽種期很短，從2月到4月，5月到8月。而在貧脊的土壤上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現，因為它不需要複雜基礎設施或空間，只需要一間房子，前院與後院，山坡地，不規則或不滿石頭的土地。人力也簡單，女人、小孩、老人都可以，不過男人都在城市中工作。這些剩餘的人口就擔負起這個菸草產業的責任，傳承下去。

只有那些有執照的人可以種植菸草。這樣的人很少。在60-70年代對於菸草的勞工運動興起前，菸草執照被掌控在那些地主手上。今日小農得到了部份的土地，而當年發生游擊戰時，許多地主逃去了都市，「他們」的佃農，利用那些從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等來的金錢去購買小小的一塊地，當然也需要執照。許多菸草農在那邊很久，歷經了以色列22年的佔領，以及後來的佔領年代，還有2006年的戰爭。透過這樣，他們取得執照，得以栽種菸草。

那要怎麼解釋菸草在黎巴嫩南部的成功呢？為什麼這些窮人這麼依賴它呢？

其一是關於什麼在工作以及誰在工作。黎巴嫩南部的人口和地理條件開啟了種植菸草的環境，但是也不利於持續。此外，這個作物的成功是被黎巴嫩政府所結構的，因為政府給合格的種植者固定的價格合約(8-13美元/克)，這無關全球菸草價格的波動，也讓政府可以獲得很大的利潤。

這個合約同時被種植者討厭和喜歡。確定的收入來源同時讓他們工作很辛苦。黎巴嫩政府把菸草補助視為一種對於需要人民的義務。不過政府也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

關於菸草，大致有兩種論述。其一是關於生命，勞動，愛。許多成功的南部人把他們的成功歸因給他們的努力種植菸草，並養活整個家庭，讓小孩得以受教育翻身。那些種植的人幾乎都是女性，也都很驕傲可以從事這行，收割、揀選、乾燥、包裝等等的技巧都是相當以引為傲的。在其眼中，菸草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另外一種論述是從那些購買菸草的人來的，也就是Régie的官員。他們覺得品質參差不齊，也抱怨要從那些種植戶中買過來，實在是種不可靠的商品，而且還要重新包裝，儲存在倉庫，和全球的其他菸草公司議價，那些公司還要求要買一定的量好獲得利潤，有些人說這些辛苦栽種的菸草和垃圾沒兩樣。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顯示了這個行業的爭議所在。

不論菸草的使用和目的為何，因為可以取代之的作物相當少，所以菸草仍然還是會是南部黎巴嫩的經濟命脈。而邊界的所謂「前線村莊」是種植苦作物的最積極的地方，因為這可以帶來穩定的收入，也象徵在這個戰亂頻仍、暴力與毀壞遍佈的地方，仍有生生不息的一絲希望。■

來信寄給Munira Khayyat
<mk2275@columbia.edu>

> 轉動評鑑的螺絲：高等教育的墮落

by John Holmwoo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英國, ISA執行委員, 2014-2018

許多評論者認為，夠過評鑑審查 (audit) 的「新公共管理」上軌道，甚至被「公共價值」所取代 (把提供給公眾的價值極大化)。在英國，整件事情看起來都非常空洞，特別是對於大學來說更是如此。最近的改革已經否定了大學的公共價值，只強調其對於經濟成長和人力資本的貢獻，把學生看做是「消費者」。在這個脈絡底下，使用評鑑審查去形塑大學，開放給市場，然後強定管理，已經變成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英國，學術界已經開始在等今年的學術評鑑的結果了 (REF)，因為 12 月結果就要揭曉。REF 每 6 年一次，並且會決定系所的收入量 (其他則包括學費和外部的資金)。這個收入的分配取決於評鑑的分數，而評鑑則是由評鑑委員會所作的審查，由其他大學所組成。分數是匿名和累計的，標準是評鑑一個單位的研究環境，以及對於外部、非學術的影響與貢獻。

REF 是非常花時間的一件事情，而且也相當花錢，因為整個過程要有所管理。這個過程也被批評是會讓那些「安全」的研究比較可能獲得正面的評價，讓那些單位有策略操作的空間，並且減少合作的關係，因為大學都要忙著管理研究和發表。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直接的巨觀大學管理策略和目標以及微觀個人管理之間的連結，因為評量委員會是受到官方保密法案所約束的，所以都不公開。不過事情很快就有改變了，因為負責 REF 的單位：英國高等教育資金委員會 (HEFCE) 現在正在執行 REF 的陣列化。

在 2001 年被退回的計劃書現在回來了，原因並不是使用文獻引用資料的方法上的困難，而是資料的增加讓這個計畫又有了價值。

REF 的「陣列化」是個「巨量資料」的計畫，每個學術人緣都有出版的引用的資料，並且在線上可以收集得到。此外，現在的系統非常花錢，所以私人公司像是 Thomson Reuters 可以用低廉的價格提供大量的資料。專業審查將會被根據巨量資料跑出的分析所取代，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學術自由，因為學術標準被市場邏輯所取代。的確，英國的學術界已經和 REF 一起成為這個共犯結構，而 REF 陣列化讓學術管理和巨量資料公司結合在一起了。

David Eastwood (Brwne Review 成員) 建議把高等教育的公共資金來源用全球市場機制來取代之，並且建議矩陣化可以更進一步使用來推動全球化。REF 的全球化透過審查評鑑會變得很可怕，花錢，有可能造成外界具有敵意的回應，Eastwood 則說英國可以從 REF 的高名聲之中獲利，這是大學管理階層願意接受的觀點，而學術人則不會。國外的資金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可能會被要求和 REF 合作，也可能受制於私人公司的遊說。

這些都是在沒有公共討論的前提下發生的，在學術界沒有討論，在公共領域也沒有興趣討論這種教育民主的問題。學術自由可能和政治的自由不同，但是政治自由必須有學術自由為基礎。

REF 已經把學術研究讓渡給官僚管理系統了，並且尋求資金的最大化，但是陣

>>

列化讓其便得只是一種巨觀管理的工具，實際上陣列管理的 REF 是用公共資料下去運作的，這代表了個人的學術人員可能會被追蹤，但是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現在的系統上。任何提供服務的公司，若是提供系所排名的服務，那麼也可以提供相同的服務給那些要聘用教師的系所。的確，文獻引用陣列是在 1970 年代早期被發展出來達到這個目的的，而現在的巨量資料提供了「市場機會」，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版本的「教育機會」。

這個巨觀管理的引進對於英國大學來說是個新的潮流，叫做 Russellton。這代表了 Russell Group 的對精英大學的自我宣稱。首先，這包括了一個以小時為主的工作模式，要去紀錄在各種學術工作之上花了多少時間，好方便提供審查，並且包括了幾個方面：目標、目的、機制。以下介紹這個複雜的架構 (特別是空洞的內容也可以有那麼複雜的架構)：

- 目的 2: 增加 Russellton 大學的高品質輸出。
- 目標 2.1: 去達成和維持 REF 的 GPA，讓其超過平均的 2.71。
- 目標 2.2: 去增加大學研究的品質，而其是用 3 年的引用影響力為衡量，到 2020 年要增加 20% (2013 年是 1.68%)。
- 目標 2.3: 要前 10% 的 3 年的出版量增加到兩倍 (2013 年是 21%)。
- 目標 2.4: 增加國際合作出版 55% (2013 是 40%)。
- 目標 2.5: 增加引用數量 (2013 年是 62,413)。
- 機制 2.5: 開放使用、引用、h- 索引、文獻引用矩陣必須整合到整個評鑑架構之中，讓學術人緣可以增加產量與品質。

所以，

所以，大學評鑑的螺絲正在讓學術界空洞化，變成只是「可評鑑的機會」，犧牲學術自由，讓位給市場。這就是 HEFCE 想要帶來的結果。■

來信寄給 John Holmwood <jholmwood@jas.edu>

> 埃及的吉普賽人

by Alexandra Parrs,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埃及的Dom人，存在卻看不見。Arbu繪。

對於許多埃及人來說，吉普賽人是埃及人這件事情是很令人驚訝的。這是中古世紀對於從東方到埃及的旅者的稱呼。而也會令人吃驚的是，這些人在埃及通常被認為有魔法的東吉普賽人，或是 Dom 人，其實是埃及的賤民階級。

東吉普賽人叫做 Dom。這和敘利亞、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的命名不同。可是，雖然 Dom 和 Roma 人在中東被過度的污名化，Dom 在埃及並不被官方所承認，部份原因是因為宗教是主要的承認基礎。埃及的身份證會列出一個人的宗教。而通常有三種：基督宗教、伊斯蘭、猶太教。到目前為止，除了這些宗教的人是沒有身份證的。因為宗教被官方所規定，所以其他的身份，像是族群，就沒有被採用了。那些常用的族群名稱，像是 Bedouin，Nubian，Dom 等，是民間在用的。

認同的缺乏是以統計類別為基礎的，所以不太可能去推估埃及的 Dom 人口。主要的資料提供者是福音教派組織所提供的。他們估計大約 1 到 2 百萬人，多數是穆斯林。埃及的 Dom 被分成兩個次群體，這在中東的脈絡下更具有意義。那些群體的名稱是 Ghagar，Nawar，Halebi。這些這阿拉伯文中也有不好的意義就是。福音教派組織認為 Ghagar (意思是粗野的) 可能是埃及 Dom 人口的最大宗。

因為 Doms 並不具有官方身份，政府也沒有驅趕或是同化他們。在歐洲，強迫的同化和邊緣化似乎是唯二的選項，因為那些遊牧人口

>>

被認為是偏差的，或是有敵意的。在埃及剛好相反，因為遊牧人口在歷史上是整合進主流社會的，即使那些人不被接受。此外，中東的遊牧人口通常被認為是 Bedouins，而非吉普賽人。

埃及政府似乎是知道吉普賽人的存在的，但是他們是一個群體嗎？還是只是一種想像？Nabil Sobhi Hanna 做過民族誌的田野研究，這是在 50 年前，於一個半遊牧的 Ghagar 的社群之中，位於 Sett Ghiranaha 的區域，也是在 Nile Delta 地帶。Ghagar 人在他的描述裡面，總是居住在村落的邊緣，有著很不同的職業：販賣馬或是驢子的人，鐵匠，或是娛樂者。近年來，許多人已經在 Cairo、Sayida Zeinab、Sayida Zeinab 的市區建立起了社群，在那裡他們是鐵匠，販賣金屬者，「思考者」，賣木材者，音樂者、舞者，販賣皮革製品者，藥頭等等。有時候也是乞丐。在 City of the Dead 的人是 Zabaleen 和 Orthodox Copts，多數是拾荒者。而雖然大多數人的 Dom 是遷徙的，但是他們的活動可包含了短程的移動，像是打工，租屋，也可以在同一個地區內搬家。不過他們還是處於埃及社會的邊緣。

當多數的埃及人並不知道吉普賽人的存在，但是也有人知道，並且會說他們曾經在旅行的時候遇過占卜的吉普賽女性，或是娛樂者，或是小偷。雖然 Dom 並沒有被完整認出來，他們似乎是存在的，至少存在於人們的潛意識裡面，也可以被輕易的在特定的脈絡或是片段中被實體化。

吉普賽的人物形象時常在鄉村出現，他們可能是其他的部落。吉普賽人被用零散的方式所認識，像是對於埃及音樂的貢獻，或是透過 Ghawazee，Nawar 部落的肚皮舞等等。Ghwasee 是 Harem 的舞者，19 世紀在 Cairo 被禁止，後來被 50 年代的電影所浪漫化。Tamr Hindi 的有錢年輕男性和 Ghawazee 相戀，然後想要受到對方的尊敬。不過後來失敗了，於是 Ghawazee 人留下來，從此兩邊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

吉普賽也在 Moulids 的時候成為娛樂者。部份是朝聖，部份是狂歡，部份是伊斯蘭教的慶典。在埃及，Moulids 是不受縣至於先知的生日的 (Moulids en Nabi)。但是可以指向在地 Sufi 聖人的慶祝，這總是吸引埃及政府的注意，因為 Moulids 是被 Shia 和 Sufi 派的政府所認可，而不是 Sunni 政權。可是 Sunni 是埃及的大宗。儘管官方的否定，Moulids 很廣泛得出末。他們很像基督教狂歡的無政治府時代，一般的規則的都可打破。性別隔離不存在了，性禁忌也被遺忘了，跳舞很被鼓勵。Doms 則是 Moulids 的一部分，這不讓人驚訝，因為一旦你了解他們娛樂和非道德的藝術之間的關係之後，就可以理解了。女人跳舞，男人玩音樂。Dom 的女性從事一般女性不會做的事情，或是介於兩性之間的事情，他們是 Simmel 筆下的陌生人。

所以，在埃及，吉普賽人是誰？他們不被官方認同，是被人為是在鄉村的游牧民族和販賣馬的人，或者是在城市娛樂者，Moulids 舞者，或是 Ghawazee，占卜者，乞丐。總之，他們主要是窮人，被邊緣化，或是被忽略。這就像是 Edward Said 所說的東方主義，也就是在歐洲意義下的東方人，吉普賽人是「他者」，也備件構成具有外國情調的他者。諷刺的是，埃及的吉普賽人也被「東方化」了，他們的特徵很像那些東方人，或是在歐洲的吉普賽人。他們象徵危險、驚奇、吸引的阿拉伯男性 (危險的有趣) 或是女性 (性的 Harem)。男性被認為不可信任的竊賊，女性被看成謎樣的危險，像是肚皮舞者，或是占卜者，或是 Ghawazee 妓女。

對於在埃及 Dom 的研究是特別有趣的，因為有關於他們經驗的問題被提起了：這些跨國的吉普賽人是如何實做邊界和民族國家的？這些實做和認同怎麼樣被建構起來和運行？Dom 和 Roma 是永遠的賤民階級嗎？他們會是國族認同的永恆威脅嗎？而像是埃及這樣的國家怎麼處理這一不論有宗教信仰或是沒有宗教信仰的這群人呢？■

來信寄給 Alexandra Parrs <aparrs@aucegypt.edu>

> 法國被懷疑的跨國戀人

by Manuela Salcedo,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aris, 法國, Laura Odasso,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比利時,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Biography and Society (RC38) 會員

「這太誇張了！法國政府給摩洛哥政府命令要避免犯罪，可是像我們這樣的情侶卻要因為法國很不一樣的法律而付出代價 [⋯] 而你們應該感到羞恥。」(1)

「這太誇張了！法國政府給摩洛哥政府命令要避免犯罪，可是像我們這樣的情侶卻要因為法國很不一樣的法律而付出代價 [⋯] 而你們應該感到羞恥。」(1)

在過去 10 年來，外國居留人士 (Third Country National; TCN) 或是歐盟的跨國情侶的權益受到和大的侵蝕。他們不是公民，而是居民，被賦予限縮的法律權益。在法國，政府使用法律管理的手段去介入跨國情侶的親密關係。這包括同性戀和異性戀。此外，法國政府也似乎更保護本國的家庭和情侶。

透過訪談這些跨國情侶，在多重的地方進行，包括了參與觀察那些跨國家庭和移民的權利組織，例如 Public Ban on Lovers 和 Associ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Homo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 for Immigrants and Residents，我們研究法律改革，政治脈絡，以及官員的態度等等，會怎麼影響跨國伴侶。

在法國，移民法律區分被選擇的移民 (高度被認可或是需要的移民) 和非選擇的移民 (家庭依親或是政治庇護)。移民若是為了加入伴侶或是家庭的，是被歸類成非選擇的移民，儘管家庭移民是被憲法和國際法慣例所保護。公共論述中，家庭移民包括了民族家長主義和邊界的建構。實際上，外國居留人士所受到的對待是取決於他們的國籍、地區、性別、性傾向。從後殖民國家來的移民，像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面對了更多的限制，這是因為他們在法國已經不是少數了。而對於穆斯林侵入的恐懼，以及阿拉伯和穆斯林這種混合的想像，這些都影響著伴侶的權益。

很弔詭的是，法律卻也影響法國那些和外國居留人士成為伴侶的本土法國人的權益。這個污名化過程也影響了外國居留人士或是歐盟的另外一半，變成了其「陌生人」，因為會被認為他們選擇了外國伴侶而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 限制移民

在法國，在法律和實際之間有著很大的矛盾。限制家庭移民已經是自從 2003 年以來的首要立法任務。而有 5 項法律讓跨國戀人產生很大的困擾。2006 年的兩項法律：「Sarkozy II」 和「Clément' s law」是為了要辨識假婚姻移民而設立的：

婚姻已經在過去 5 年有很大的變化，成為了主要的移民方式。而被政府破獲的假婚姻移民案例卻沒有減少。(P. Clement, National Assembly Speech, 22.03.2006)

民事的官員被要求要一起審查伴侶，或是有必要的話，要隔離審查。官員若是懷疑婚

>>

姻，可以有權力不讓其婚姻合法，並起訴之。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任何的伴侶若是缺少的法國的居住證明的話，就要提供進一部資訊。而即使結婚以後也要接受審查，要提供帳單的資訊去證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真實性。

2009年之前，政治論述把跨國婚姻描述成「移民的首要來源」，讓人覺得新的婚姻類別，像是同志婚姻等，是恐懼的，也被認為是有可能作假。這和所謂的「白色婚姻」，有很大的不一樣。在後者，婚姻一方完全知道另外一半的企圖，是可以欺騙政府的。2004年有278,600個婚姻，其中5,272被民事註冊官員所處理(1.9%)，而其中的737個案例是無效的，包括了444個是假結婚。(2) 最後卻只有4個人被法律認定確定是假結婚。

為了得到公民資格，法律規定外國居留人士必須歸化到法國社會裡面(語言測驗、法國公民的權利義務測驗等等)。婚姻本身並無法直接讓你取得法國籍。而這個過程已經從1984年的6個月被延長到現在的4年。

> 管理跨國婚姻

官員為了控制移民，已經用了許許多多的方式。(3) 核發簽證、工作權的單位必須要去保或國家安全，則通常有著非法律的對於移民的理解。官員是在整個管理體制的最下方，直接面對案例，且其權力取決於他們對於各種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法律上，是Prefect單位要去決定外國的人居留問題。可是實際上，跨國伴侶常常會面對這些在第一縣面對移民的官員，這些官員則把這個職位看成是骯髒的位置。「骯髒性」就是從其工作經驗而來的描述，包括了在工作場所的「氣味和聲音(外國語言)」，這被用來對比乾淨和安靜的管理階級辦公環境。而這些官員的個人態度也會影響到那些伴侶，因為伴侶要和這些其實沒有實際權力的官員打交道。真正的權力掌握在那些其實根本沒看過移民的人的手中。

> 面對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

和跨國家庭有關的移民政策有許多種的歧視。被警察歧視、被政府官員歧視，這些都會發生在法國籍另一半的身上。而處理移民事務的第一線官員也會造受到這樣的對待，這是Goffman所說的污名，是會延伸到這些官員上面的。年齡、收入、外貌等都會讓人去判斷一對情侶的真愛與否，可是卻不會影響到那些已經存在的污名。

跨國戀人的私人領域因此被公開了，當這些人在其他人面前講述自己的關係、感覺、愛情、問題時，都是要去證明自己的真正情感。有趣的是，法國政府和跨國戀人之間所認為的婚姻定義卻相去不遠。對他們來說，愛是婚姻的前提。制度的種族主義或是政府的排外主義侵蝕了公私的劃分，也入侵到了家庭生活裡面。■

來信寄給 Laura Odasso <la.odasso@gmail.com> 和 Manuela Salcedo <manuesalcedo@gmail.com>

註1：Notes from Laura Odasso’s fieldwork journal, December 10, 2009.

註2：Belmokhtar, Z. (2006) “Les annulations de mariage en 2004.” Infostat justice 90: 1-4.

註3：Spire, A. (2008) Accueillir ou reconduire, enquête sur les guichets de l’immigration. Paris: Raisons d’agir.

> 徘徊在土耳其的幽靈

by Aylin Topal,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Ankara, 土耳其

Gezi抗爭是Erdo an總統揮之不去的幽靈。

過去 2 年來，土耳其的社會和政治發展已經對於國家政體開啟了新的辯論，包括了什麼是這個政體的本質，什麼造成了 2013 年 6 月的抗爭，以其後果為何？ (1)

土耳其的新自由主義可以追朔到 1980 年 1 月 24 日，那時土耳其的結構調整計畫開始，而 9 月 12 日土耳其的軍隊政變發生。軍隊掌權，設立了 2 個目標。第一，是要整肅左派和工會；第二是要繼續經濟重建計畫，保持上層階級、西方資本、Bretton Woods 制度的利益。後軍隊政府時代可說是新右派當道的年代。

而後的 20 年，也就是 2002 年，法律和發展黨 (JDP) 贏得了國會多數，這是 50 年來的第一次。市場給予了這個勝利很好的回應，正如 Merrill Lynch 所指出的，「單一政黨的政府會讓土耳其的經濟變好」。的確，在其執政之後，宣佈要終結經濟危機，讓政府介入降到最低，並進行企業私有化，這仍然是 JDP 的主要財經政策。

2013 年的 5 月，總理 Tayyip Erdo an 宣佈了 Taksim Square 重新發展的計畫，其位於 Istanbul 的中央，也是政治抗爭的中心所在。而旁邊的 Gezi Park 則是少有的綠地。重發展計畫包括了在 Taksim Square 的清真寺重建。以其在 Gezi Park 的軍營歷史建築。現在則還包括了購物廣場。總理也宣佈了其他發展計畫，包括機場，以其一座跨越 Bosporus 的大橋。

就像其他 JDP 通過的法案一樣，這些計畫並沒有經過國會充分討論，更不用說公民社會的同意了。土耳其工程和建築工會和都市規劃委員會立即表示了反對意見，其他的運動者團體也加入，聲明要停止那些建造案。5 月 28 日，這些人開始去紮營抗議。

5 月 31 日清晨，警察使用暴力攻擊抗議者，並且焚燒了帳篷和其他的武力，像是催淚瓦斯，要剷除那些他們口中的「極端分子」。

>>

在當天晚上，反對團體和其他 Istanbul 的協助，號召到了上百萬群眾，衝到公園裡面，抗議警察的暴力驅離，並唱“Everywhere Taksim, everywhere resistance,” “Dictator resign!” 和 “Jump! Jump! Whoever does not jump is Tayyip!”

這樣的反應並不令人訝異。而另一方面緊張與不滿仍然逐漸升高。2012 年 12 月 18 日，當 Erdo an 到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看軍事衛星的發射時，警察暴力的驅離抗議學生。雖然總統說願意調查，可是他卻批評教授可恥，要他們好好教那些學生怎麼尊重別人。接下來各大學的抗議都被鎮壓。4 月時，Emek 戲院被拆，因為要設置娛樂和購物區，這引起了更大的抗爭。而和平的抗爭又被警察所暴力鎮壓。政府的威權心態和保守主義變得越來越明顯，在 5 月更進一步限制販賣酒。這個政策是 Tayyip Erdo an 宣稱用來保護青少年和宗教律法的。同時，有一對情侶接吻而被取締。所以接下來的抗議者就到同一個地方去集體接吻。

總理對於 Gezi 抗爭的回應是說有上千人抗議，沒問題，可是我可以帶上百萬人去對付你們。所以巴士把他的支持者帶到了 Gezi Park，並高喊「把 Taksim 拿下！」和「少數的人們，不要試探我們的耐心！」

Gezi 的抗議是在質問政府的正當行，並挑戰 JDP 的統治。可是，這個抗爭其實癱瘓整個政府，把保守的政府的獨裁真面目揭露了。從 2013 年 7 月開始，政府開始起訴抗議者，說抗議是在破壞這個國家的文明。

在許多對於總理、家庭、閣員的貪污的指控被放到網路上之後，Erdo an 開始對付 Gülen Brotherhood。有個影像紀錄顯示了總理要其兒子存入大量的現金。而 Erdo an 則說這是對抗政府和接下來選舉的陰謀與政變。JDP 政府接下來控制了議會，並且通過新的法案，讓國安情報單位可以不受限制地審查人民的出版與言論。可是，8 月 9 日，Erdo an 得到了 51.8% 的得票當選總統，投票律則有 73.4%。在這場選舉中，Erdo an 不斷說自己是有經驗的總統，不會像前任一樣。他似乎要掌控一切的權力。而法律上的議會制和實質上的總統制不是責任政治，也是對於獨裁的絕佳掩護。

面對這個政體改變的時刻，土耳其政府在 JDP 主導下，其實正在流失其正當性。這也就是盤旋在政府和總理上的幽靈。■

註 1：需要來源的話請寫信給作者。

來信寄給 Aylin Topal <taylin@metu.edu.tr>

> 哈薩克的輿論操作

by Almas Taizhanov, 哈薩克社會學會, ISA會員

Gaukhar Monko是烏克蘭裔的哈薩克人Sergei Monko的哈薩克妻子，說：「不要戰爭」，其眼淚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

哈薩克的烏克蘭和俄國比鄰，也有著前蘇聯的相同地位。但是有一點必須提出來的是，兩著有著相同的悲劇：兩國都都在蘇聯集體化時代 (1932-1933) 有大量人民死於飢荒。根據統計，這個數字在 1934 年是 1,840,000 名哈薩克人，大約是 1930 年代總人口的 47.3%。幾乎一半的人口死亡，這個空缺由第二次大戰後的大量蘇聯移民所填補了起來，這也重塑的哈薩克的人口結構，根據 1959 的人口統計，哈薩克人只有 30%，但是 1926 年有 58%。

烏克蘭的飢荒也奪走了 3 百萬條性命。這個數字遠比哈薩克小。1926 年的哈薩克有 2 千 3 百萬人。此外，在烏克蘭，政府徵收穀物，但在哈薩克，人民失去牲口，這也是主要營養來源。烏克蘭人可以從飢荒中存活的機率大一些。

而蘇聯大量移民人口的影響就是兩國的人口都有大量的俄國人。這在北哈薩克和東烏克蘭特別如此 (Donetsk 和 Lugansk)。我們在今日可以看到發生許多衝突。

沒有社會學家研究過哈薩克的獨立運動，特別是在北方的區域。然而，1999 年 11 月，一群武裝獨立運動者闖進 Ust-Kamenogorsk 城市，這在兩國邊界。他們是由 22 個俄國人所組成的團體，11 人是蘇聯的公民。這個事件被哈薩克的國安局所封鎖住，所由人被處以 6 到 8 年的刑期，期滿後放回俄國。

儘管這段歷史的存在，哈薩克對於獨立運動並不是非常關注。而且，

>>

根據一份由哈薩克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 Strategy 所作的調查，在烏克蘭邊界衝突後，61% 的哈薩克人支持蘇聯兼併 Crimea，23% 沒意見，只有 6% 的人說這是非法行動，侵犯烏克蘭的領土。這個調查顯示了媒體掌權者和 (哈薩克、俄國、西方) 人民態度之間的關係。

根據 2011-2015 的哈薩克資訊和通訊部的發展計畫，有 2740 哈薩克的媒體組織 (平面、電視、廣播、電子等等)，其中 20% 是用哈薩克語播報，34% 是俄語。其他是兩種都用，但偏向俄語。而網路上的哈薩克語網站遠少於俄語，所以在哈薩克網路幾乎是俄語的天下。此外，俄語電視頻道是免費的，俄國報紙和雜誌和哈薩克也相當普及。

更據上述調查，受訪者的資訊來源是：哈薩克媒體 (50%)，俄國媒體 (31%)。其他包括了網路和社群網站像是臉書 (9%)，以及朋友、同事、親人 (7%)。西方媒體來源只佔了 1%。

這樣的資訊來源怎麼影響公眾意見呢？在那些接受哈薩克報媒體的人中，54% 贊成俄國的兼併行動，20% 反對，26% 不知道。可是，那些接受俄國媒體資訊的人中，84% 贊成，只有 4% 反對。而那些接收西方媒體的人有 31% 贊成，39%z 反對，31% 不知道。這是個很令人驚訝的結果，特別是那些期望收看西方媒體的人會特別反對俄國行動的人來說。這是令人驚訝的。那些長期上網的人裡面，48% 支持俄國，35% 不知道，17% 反對。如前所述，哈薩克的網路是很「俄國的」。

在烏克蘭和俄國的衝突期間，政治宣傳到達了前所未有的境界。電視和平面媒體讓整個事件更加讓政治宣傳有效。兩國的政治宣傳也影響著哈薩克人。同時，哈薩克的媒體卻沒有宣傳什麼。結果就是哈薩克的民意被俄國媒體所控制著，而且也製造了意識形態對立，像是愛國者、自由派、崇洋派以及俄國派兩邊。社會科學研究的缺席讓事情更糟，這也讓哈薩克的未來更加堪慮。■

來信寄給 Almas Taizhanov
<almas.diamond@gmail.com>

> 地球的未來

by Emma Pori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賓, 前ISA執行委員, 2006-2014, 現任ISA 的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CSU)代表

國際科學委員會 (ICSU) 在 Auckland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年會，討論國際科學和未來發展。第 31 屆的主題是「全球變遷的 30 年來慶祝」。聚焦在科學的開放使用和警告科學的誤用。

ICSI 於 1931 年成立，是非政府的組織，在全球各地都有會員 (120 的成員代表了 140 個國家)，也包括了國際科學組織 (31 個成員)。ICSU 的活動聚焦在 3 個領域：規劃協調國際研究、科學政策、科學普遍性的提昇。這是政府和聯合國組織的顧問團體，也是全球知識社群的代言人。議題包括環境和科學行為。

紐西蘭的總理 John Key 主持了開幕的會議，強調了該國的特別環境挑戰和對於國際研究的貢獻。Peter Gluckman 是首席科學顧問，也是紐西蘭皇家科學院院長，給了主題演講：「科學的變遷本質：科學家可以面對挑戰嗎？」他警告的聽眾，說科學系統變化得非常快，若我們不好好便對這些挑戰，那會失去公眾的信任。

為期 5 天 (8 月 31 日到 9 月 4 日) 的會議，ICSI 審查了其重要計畫的過去 30 年進展，包括：

- 氣候變遷的跨政府計畫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國際地理生物計畫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
- 世界氣候變遷計畫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
- 生物多樣性科學 (Diversitas; Biodiversity Science)
- 國際人類計畫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 地球科學計畫 (Earth Science Program)

這些是 ICSU 未來計畫 Future Earth: Research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的基礎計畫。.

ICSU 和其他兩個學術機構合作，試圖去建立一批新的科學家：Global Young Academy (GYA) 和 World Academy of Scientists (TWAS)。從 1990 年開始，在 Berlin 有德國科學院的支持，GYA 有了 90 的科學家的規模，遍布全球，舉辦工作坊和會議去分享研究成果。TWAS 是全球科學的組織，有包括 50 經濟體的科學家社群。在位於義大利的 Trieste，TWAS 試圖要「增進創新永續發展，並透過研究、教育、政策、外交等方式達成。」

在 2010 年時，ICSU 邀請了 ISA 去整合社會科學，但是這樣的努力還要持續。現在，ISA 正在重新考是否值得繼續和這群硬科學的人一起合作。從 2010 到 2014 年，ISA 的執行委員和 ICSU 的拉美地區執行長 Alice Abreu (2006-2010) 是 ISA 的 ICSI 代表。同時，Stewart Lockie (前 ISA 的 RC23 的環境社會學委員會會長) 會是 ICSU 在策略規劃和研究委員會的成員 (2013-2014)。■

來信寄給 <eporio@ateneo.edu>

> 羅馬尼亞團隊

by Ileana Cinziana Surdu,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羅馬尼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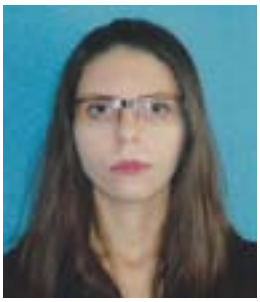
我們這個團隊自從 GD3.1 期開始加入 (2012 年 11 月)，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的團隊有了很大的改變，這是好事，因為我們從不同的成員身上學到了很多翻譯和編輯的技巧。我們都是社會學家，多數是博士生，都相當有熱情與活力。全球對話讓我們的團隊有了很好的機會去探索全球社會的各種議題。

我們的團隊有 6 為常態成員，以下我們介紹了這些成員和至少加入過編輯 5 期的人。除此之外，有其他 11 人都曾家參加過編輯至少 1 期，他們是：Ramona Cantaragiu,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ș,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Ioana Cărtărescu, Mădălin Rapan, Andreea Acasandre, Daniela Gaba, Alexandru Duțu, Gabriela Ivan, Levente Szekedi。

Cosima Rughini 博士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社會系的教授，也是 Compaso 期刊的主編，是一本比較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期刊。她教方法論，研究興趣是量化方法，問卷的修辭，以及透過遊戲和數位媒體的科學溝通方式。來信請寄到：cosima.rughinis@sas.unibuc.ro

Ileana Cinziana Surdu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生。她曾是方法論和市場與工作的助教，也參與社會整合和發展等研究計畫。其興趣包括了時間社會學工作生活平衡、家庭與傳統、非語言溝通。來信請寄到： ileana.cinziana.surdu@gmail.com

Adriana Bondor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候選人。興趣在羅馬尼亞的社會學史。專業包括了各個領域：社會史、社會學史、文化與記憶、羅馬尼亞與歐洲的共產主義。她希望未來從事文化社會學。來信請寄到：adrianabondor@yahoo.com



Alina Costiana Stan 正在兩所學校工讀聯合博士：University of Bucharest 和 Lille 2 University (法國)。她的興趣包括工作暴力、工部門工作關係品質？她特別對於下列感興趣：法律制度對於社會過程的影響、工作環境的歧視、性別、公共管理社會學。來信請寄到：costiana_stan@yahoo.com

Elena Tudor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和 Research 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 (Romanian Academy) 的博士生。其興趣在於國際遷移和政策。參加過相關的研究，和歐洲委員會與在地 NGO 合作過。來信請寄到：elenatudor7@yahoo.com

Miriam Cihodariu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社會學博士候選人。之前是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 的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她有過教學和研究的經驗，最有興趣的是敘事心智地圖方法，認為自己是這個領域的先驅之一。其博士論文研究超過 3 年的慶典與社區敘事。. 更多資訊可到：http://miriamcihodariu.com/index.html

來信請寄到：miriam.cihodariu@gmail.com

>>

Mihai-Bogdan Marian 擁有法律學位 (University of Bucharest，兩個碩士學位分別來自國家安全和國際環境安全領域。現在是博士生。興趣是社會變遷、全球化。現在也聚焦在這些主題上。來信請寄到：mihaimarb@yahoo.com

Lucian Rotariu 是 Faculty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生。過去 3 年他從事了偏差和法律社會學的研究。來信請寄到 :stefan.rotariu@sas.unibuc.ro

Monica Alexandru 是在 Exact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Bucharest) 工作的社會學家，其從 2012 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是關於國際遷徙、社會流動。最近她和國際組織和研究單位合作研究人口遷徙和販賣的研究。來信請寄到：alexandru_monica@yahoo.com

Balázs Telegdy 現在是 Sapientia Hungarian University of Transylvania 的助理教授。他從 Babe - Bolyai University 取得社會學碩士，研究區域不平等和社會問題。現在正在撰寫羅馬尼亞社會學的歷史。其他興趣包括了轉型社會學、制度信任、社會網絡分析。來信請寄到：telegdyb@yahoo.com

Cătălina Petre 是在 École Doctorale en Sciences Sociales,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生。最近獲得了比利時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的獎學金，將從事 4 個月的日常生活社會學研究。她對身體社會學、非語言溝通、組織社會學、人力資源管理有興趣。現在從事溝通、組織社會學和人資管理的研究計畫。博士論文學位是「年輕女性對於羅馬尼亞社會主流的審美觀」
來信請寄到：guliecatalina@yahoo.com

Oana Mara Stan 從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畢業，取得心理學和社會學學士，管理學碩士，社會學博士。過去 8 年來是跨國媒體和娛樂公司的人資專家。期研究興趣包括了比較社會研究的實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鄉村發展、生涯規劃。現在在國際研究團隊 Crant 中研究人評量和勞動關係。來信請寄到：oanamara2000@yahoo.ca